

社会良心

时代眼睛

当今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的挑战 及其角色的再探讨

许文荣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向来众说纷纭，这或许显示了各个社会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多元观。笔者无意去加以整理这些歧异的想法，这是一项艰难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本文对于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取笔者所认同的看法。

社会学家席尔思 (Edward Shils) 在本世纪 50 年代曾为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则经典式的定义：“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他们对于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社会的规范，都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个社会中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在这少数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书写的论述、诗或立体感的表现、历史的回忆或书写、仪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动，来把这内在的探求形诸于外。穿越当下的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标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¹

在席氏的叙述中，知识分子群应抱括了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演艺工作者、神职人员等等，然而，知识分子比这些行业 / 专业人士有更宽广的兴趣与关怀，各行业 / 专业人士若只对本身的专业领域感兴趣，还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脑力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其敏锐的嗅觉及爱好思考反省的大脑，不满足于事物的表象而求本质，他们对社会、国家以至全世界的美好价值（神圣的事物）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论点。

席氏对知识分子的论述中，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如爱德华·萨依德 (Edward Said) 所强调的“批评者”的角色，这是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最本质的性格，也因此使他们被誉为“社会良心”。为了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公正、自由、爱等）他们一面批评世间的无理，一面推动这些美好价值的实现。² 2,500 年前的孔子也曾有提及知识分子的这项角色，他说：

¹ 席思尔，〈知识分子与权势：比较分析的一些角度〉文收《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转引自爱德华·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 年，页 72。

² 余英时，〈略论中西知识分子的源流与异同〉，《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家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页 125-126。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³换句话说“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也”，这里所谓的“议”指的正是批评的意思。

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多数不隶属于任何社会阶级或团体，不服事任何权力或权威，尤其是统治阶级，这使他们更能发展出“自由批判的精神”；一如爱德华·萨依德所说的，他们是“另类人”、“业余者”：即他们的动力来自对事物的关切和喜爱，而不是为作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或追求狭隘的专业性成就。⁴明显的他把政治人物排斥在知识分子以外。无论如何，在古代中国的“士”的传统，政治人物是与“士”分不开。“士”的中心任务一方面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是辅佐君王励精图治。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受儒家传统熏陶的知识份子群）的确兼具有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分，⁵这就难怪孟子为什么曾经痛骂提倡为我主义，不鼓励知识分子参政的杨朱为“无君”，是“禽兽也”了。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还未建立明确的知识分子传统，过去由于教育水平的低落，尤其是华族人士，因此尚无法产生真正的知识人。马来族群也是在独立建国之后才在教育上快马加鞭，80年代才有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崛起。一直以来马来西亚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生存的环境，他们多依附在社团、政党等组织里，处于从属的地位，担任献策或咨询的次要角色。马来西亚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只是近十年来廿年的事，随之而新兴的知识分子队伍尚无法建立崇高的威望，比起政党领袖及华团领袖，他们的言论尚未获得普遍的重视，去年《知识界文化宣言》的发表没有激起多大的回响就是其中一个明证。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仍然在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群中根深蒂固。从安华的加入巫统，以及

80年代的华裔知识分子参政的论争中，可以看到还是有许多人认为知识分子参政才能比较有效地进行改革。然而，参政后的知识分子往往受党鞭及官僚机制的牵制，本身反而被改革而变质，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以集团利益为依归；因此，董教总看来对本身曾支持参政的华教分子在政坛上的表现并不感到满意，一度官拜副首相的安华也莫名其妙地成为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悲剧性的人物。另一类的知识分子则选择服务于官方赞助的研究机构，如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ISIS），马来西亚策略研究中心（MSRC）、政策研究中心（IKD）等，成为执政党或政党领袖的智囊团成员，⁶这些御用文人只能跟着官方的旋律引吭高歌，肯定无法唱反调。此外，由华团及华商所成立的华社研究中心，过去也明显地服务于这两个集团，如从事编工商指南这一类的工作，虽然现今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华研至今仍然无法建立较高的知识与学术权威。

冲不出族群的藩篱，也是当今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的悲哀。从过去到现在，在我国所进行的种族路线的政治斗争，在各族里造就了族群关怀浓厚的知识分子。最近马来知识分子召开“知识分子大会”争取马来文地位的诉求很明显地仍然无法摆脱在族群斗争的格局，⁷华社所最敬重的两位知识份子，即林连玉与沈慕羽的影响力也只限于华族的范围。当今马来西亚，除了作家乌斯曼·阿旺及学者詹德拉·穆查化与佐摩·孙德南之外，还无法找到其他堪称为是马来西亚国族的知识分子。各族知识分子各自为政，拥有本身的斗争议程，这不能不说是使到马来西亚知识分子队伍疲弱的原因之一。

诸多的言论的限制与禁忌，泛政治化的干预（例如《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所遭受的），处在半开放社会的马来西亚，使知识分子不能

³《论语·季氏篇》，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84，页174。

⁴爱德华·萨依德，同注1，页121。

⁵余英时，同注2，页124。

⁶"The Growing Link between Think-tanks and Politicians", New Straits Times, 7-1-96.

⁷鲁斯丹 A 沙尼，《知识分子和巫青团》，吉隆坡：《南洋商报》18-9-95。

对现实的腐败畅所欲言。在这方面，政界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最大，报界的知识分子则其次，文化界及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相对的有较多的自由空间发挥，但有一些则选择向政权靠拢，另一些则陶醉在狭小的书斋里皓首穷经、与世隔绝。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属于少数中之少数。

世俗化在加上冷漠的社会，使大多数人趋向功利主义，对真理的探寻提不起劲，对普遍价值的维护显得意兴阑珊。多数人的愿望只想成为专业人士，提供专业知识与咨询。此外就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追求。有人认为，唯有使用激烈并带着挑衅的议论方式才能激起知识分子的斗志。在这方面，看来黄锦树及曾庆豹拿捏得最传神。

马来西亚的历史进程一直是由政党及政治人物所主导，虽然初期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但是到了后期则是由政治人物扮演着更积极的角色。60及70年代马来族群的马来语文斗争、思想革命以及回教化运动，基本上都是巫统的政治议程。真正比较属于知识分子的斗争，是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初期为下层老百姓请命的大学生运动以及从建国以来华人知识分子维护华教与反同化的斗争。这些知识分子站在少数民族（弱势民族）的基本权益而说话，所扮演的正是施压者/批评者的角色。由于不公平、不合理、滥权、贪污、裙带风等现象在我国仍然存在，知识分子的批评者/监督者的角色有必要加强，制造更多的舆论以向权威施压。近来一些知识分子也渐渐比较活跃于非政府机构(NGO)，加强知识分子的声势，这种趋势的发展是令人鼓舞的。

去年，第一次以“知识人”名义发表的《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则认为知识分子应是知识文化的钻研者，并发挥其在文化思想上的传承、转化、批判及启蒙的功能。⁸在文化上继往开新，是传统中国知识

分子的使命。当今的华社知识分子仍然应在这方面贡献所长。当然，文化建设是一项共同的民族任务，因此《宣言》认为政党在文化上的任务在于“争取国家文化政策、教育法令以及言论自由的更大空间，有效地保障马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华团的文化任务在于推广民族文化。各集团人士应各尽其职，在这个过程中不应有任何主从关系的出现。

然而，很遗憾的，《宣言》里的其中一段话：“政治人物，或具有政党背景的人物，必须远离文化团体，还马华文化一块净土”却被人误解了，有些人甚至对这段话有过激的反应。他们没有清楚再阅读下文：即“若他们坚持要在华社文化团体里活动，就必须一切以马华文化建设为优先考虑。”这种要求何错之有，我们必须阻止一些另有企图的政客利用文化组织来获得个人的政治利益，以确保我们真正为文化而文化，而非为政治而文化。

知识分子也应该是一位“超越者”，不是为自己或者某集团甚至某个族群的利益而斗争。一个只是被民族感情所驱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界是狭隘的。殷海光说，民族感情有时是盲目的，⁹因此对一个象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民族社会没有好处。知识分子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如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为了追求真道，他们必须是“超越者”。席尔思指出，古代各民族的知识阶层最初都和一种“神圣的”(sacred)传统有渊源。余英时解释说，这个“神圣的”传统便是人类古往今来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精神世界”；而落实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便成为超越的普遍价值。例如西方人所推崇的“公平”(justice)、“理性”(reason)、“爱”(love)、“自由”(freedom)等普遍价值，其来源便是基督信仰与希腊哲学；大多数中国人所肯定和接受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也和儒家思想息息相关。¹⁰

⁹ 殷海光，〈知识分子的责任〉，载于《中国文化展望》，台北：出版社与出版年代不详，页671。

¹⁰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文收《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家论著辑要》，同注2，页229。

⁸ 安焕然等，《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我们对马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点》，见《南洋商报》，6-7-97。

知识分子自始便是这些普遍价值的卫护者。他们有了超越的精神权威为根据，才能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等现象。美国近代最著名的人权斗士马丁路德金牧师，以基督信仰为超越精神权威严厉地批判美国的种族歧视与不平等；马来社会知识分子一般上比较敢怒敢言，他们所依仗的精神权威便是回教价值观；反之深受世俗化影响的华人，所重的只是个人切身利益，常常在许多议题上表现得畏畏缩缩，或者观点前后矛盾。

近来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心灵建设工程，倡导正信宗教价值观、参与心理辅导的工作、投身于各种艺术活动等，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世事的纷纷扰扰，使到现代社会人心的躁动、不安、暴戾与乖谬，需获得及时的指引与疏导，以获得心灵的安顿，或者反之将成为现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有些知识分子轻视心灵建设的工作，只讲求外在（硬体）社会体制的改革，然而，若没有内在（软体）心灵的建设的支援，社会体制的改革终归无法深入与彻底。一个外表肥壮但心灵萎缩的新一代，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新体制。因此知识分子除了是社会体制的批评者，同时也是人类心灵的监督者，对黄色浪潮、极端的功利世俗思想与自私心理、不道德的行径等也得进行批判。

知识分子若要建立崇高的威信，亦得以“修身”为重，行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崇高的道德人格可使知识分子的言论更有说服力。

刘述先有一次在访谈时说，知识分子也有贪财好色之徒，他们批评别人只因为自己得不到，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却不是无的放矢。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果这颗“良心”有道德上的严重污点，就很容易被反对派反咬一口，无法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也使知识分子的微弱的声音更加没有市场。

诗人李白的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这是有道理的。台湾哲学界泰斗殷海光也说，那些不甘寂寞的人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经常是一位独立思考者，他必须要忍受孤寂，不会迎合世俗的观点。盲目地支持而不管是非对错不是知识分子的本性；“人人都这么做，世事本来就是如此”¹¹更不是知识份子的口头禅。唯有独处的时候，知识分子才能洞烛幽明，成为世上的光，照亮在黑暗里的百姓。

马来西亚知识分子可在社会上扮演着多层角色，但同时也必须面对多重的挑战，因此他们必须要有一颗高度热诚与关爱众人的心，才能完成他们的时代使命。他们参与社会改革，不是因为一己或一小集团的利益，只因为自己内在良知的呼唤，为了正义而把个人利益、荣辱及安危置于度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或许知识分子注定是一位为爱因斯坦所形容的“为别人而活的人”，也因为如此而使他们获得社会的尊重。

（作者现为南方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¹¹ 艾德华·萨依德，同注1，页135。

掌握时代脉搏 · 激发人文关怀

語文研究

語言文字淵源
約定規範應用

知識分子的挑戰！

社會良心。時代眼睛
還于知識分子本色
誰來了解知識分子
有力感的知識分子

36

ROSA SINENSIS